

试论政治派系斗争对当代苏丹政局的影响

周 华

摘 要：1989年，苏丹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苏丹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伊阵）在哈桑·图拉比的领导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这一通过政变途径推翻世俗政权的“图拉比模式”，为其他国家的伊斯兰阵营问鼎政坛提供了范例，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但近20年后的今天，“图拉比模式”却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执政的反面教材，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阵营也因此发生了自创建以来最大的分裂。本文试图从苏丹军政权与伊阵的关系、伊阵的内部分歧等方面来探讨伊阵分裂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图拉比；巴希尔；苏丹；达尔富尔

作者简介：周华，硕士，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北京 100083）。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8) 02 - 0019 - 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正式成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1989年，苏丹穆兄会主流派——苏丹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伊阵）在哈桑·图拉比的领导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开辟了现代史上由单个伊斯兰团体实现夺权的先例，缔造了世界上第二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执政的政权，并成为当代伊斯兰世界首个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掌权的伊斯兰政权，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通过政变途径推翻世俗政权的“图拉比模式”，为其他国家的伊斯兰阵营问鼎政坛提供了范例，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但近20年后的今天，“图拉比模式”却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执政的反面教材，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阵营也因此发生了自创建以来最大的分裂。

一、军政权与伊阵的关系

1989年苏丹巴希尔政权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宣布解散议会、内阁及地方政府，冻结了1985年制定的过渡宪法，取缔了一切政党，停止国内一切非官方新闻机构的活动。1991年巴希尔政权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南方部分省份除外）实行伊斯兰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制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针和政策的准则。^{[1] 539}在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隐藏着由图拉比领导伊阵的影子。但政变初期，外界对巴希尔军政权和伊阵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伊阵内部对两者之间的

关系也讳莫如深，这便引发了外界对伊阵在政变中以及巴希尔政权中所起作用的一些猜测。直到多年后，巴希尔与图拉比分道扬镳，这层关系才开始浮出水面。

首先，1989年的军事政变是由伊阵一手策划实施的，巴希尔等实施政变的军人也是伊阵的成员，由这些人组成了伊阵打入苏丹军队内部的一个军事分支机构。该分支在政变前的领导人并不是巴希尔而是奥斯曼·艾哈迈德·哈桑准将。但由于后者坚持在政变后由军人执政，而伊阵作为一个组织只应起到“间接作用”，因此遭到伊阵领导层的抛弃。^[2]苏丹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透露说，哈桑遭伊阵领导层的抛弃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此人性格刚烈，遇事不够冷静，作为政变后执掌大权的人选“显然不合适”；其二，哈桑主张政变后应由军人直接掌权，伊阵只能从外部保障政权的稳定性，不得直接干涉军政大权。因此，伊阵领导层最后决定弃用哈桑，代之以刚从南方战场抵达喀土穆不久、根基尚不稳定的巴希尔，以便等待时机成熟后直接掌权。哈桑在政变后曾出任苏丹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但因他明确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加上在政变前被巴希尔取代的失意，哈桑很快辞去了委员职务。^{[3] 192}

其次，根据伊阵的夺权计划，军人在1989年政变中及政变后的作用只是“临时的”、“功能性的”和“有限的”，只负责“夺权”，由伊阵来“掌权”。因此，在政变成功后，军人本应按原计划还政于“伊阵”领导人。据报道，在政变前，图拉比曾在伊阵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询问军方人士：“你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军方代言人答道：“只需三天。”但图拉比接着戏言道：“不会吧！我看你们需要30年。”^[2]而事实上，图拉比一方既不希望军政权执政30年，军方也不可能在三天内完成夺权任务。另外，2000年图拉比与巴希尔分裂后公开的资料详细透露了伊阵准备从幕后走上前台的具体步骤：即第一阶段把政变打扮成“民族革命”，淡化伊斯兰宗教色彩；第二阶段视政权的巩固程度，宣布实施伊斯兰法，并逐步把伊阵领导人推向前台执政；第三阶段则由伊阵领导人全面取代军人直接执政。对于这一方案，负责实施政变的伊阵军人曾起誓要予以遵守。^[2]

最后，1989年政变之后的前三年，被认为是苏丹新生的伊斯兰政权的“巩固期”。在这一阶段，巴希尔在苏丹政权中只处于“配角”地位，占主导地位并控制局势进展的是图拉比以及伊阵其他领导人。据报道，巴希尔在这一时期更多时候是在听候图拉比“传达”伊阵的决定，自己根本没有决策权。对此，苏丹前第一副总统佐贝尔曾多次坦言：“我们只是一介武夫，是穆兄会把我们统一在一起的，我们才有今天。只要组织做出决定，我们随时准备交出手中的权力。”^[2]但随着巴希尔羽翼渐丰后，他与图拉比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紧张。最终，巴希尔在与图拉比的权力争斗中胜出，图拉比派在1999年以后被清除出苏丹政坛，由巴希尔派独掌大权。

伊阵在政变前作出“三步走”的战略决策，乃因形势所迫的不得已之举。一方面，就苏丹国内局势而言，虽然由图拉比领导的苏丹穆兄会主流派伊阵在经过20多年的斗争后，特别是尼迈里政权后8年时间的参政经验，使之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执政能力。但苏丹国内党派林立，各派实力分散，而包括乌玛党在内的一些传统党派的势力非常巨大，伊阵没有能力将各党派有效地统一到自身的旗下，还不具备通过正当渠道夺权的实力。因此，伊阵选择了策动军事政变这一夺权“捷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图拉比等伊阵领导人在政变成功后立即上台，势必遭到其他世俗和传统势力的集体围攻，新生政权便有可能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就地区和国际局势而言，图拉比在

政变后立即上台的时机也不成熟。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世俗政权的最大威胁,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与穆兄会极端势力的较量当时正处白热化,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又险些夺权成功。因此,如果图拉比急于从幕后走上台前,新生的苏丹政权无疑会面临地区孤立局面,难以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承认。另外,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一直声称要向外输出革命,而且与西方世界公然为敌,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手打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在西方世界形象不佳,很难赢得后者的信任。因此,如果图拉比在政变成功后直接掌权,新政权肯定难以赢得广泛的国际承认。正是考虑到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新生伊斯兰政权造成的诸多不利因素,图拉比才不得不选择了分“三步走”的权宜之计。

从某种程度上说,图拉比的策略在政变初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政变后,伊阵立即成立了以巴希尔为首的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不但取缔一切政党活动、逮捕各党派领导人和活动家,而且成功挫败了五次政变阴谋,使新生的伊斯兰政权趋向稳定。为了迷惑苏丹国内和国际社会,作为政党领导人之一的图拉比当时也在被捕人员之列。据称,图拉比当时对巴希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去总统府当你的总统,我去监狱当我的‘囚犯’。”^{[3] 22}而当时驻苏丹的埃及大使也向穆巴拉克政权报告说,这次政变是由“自由军官”发动的,是一场“民族革命”^[2]。因此,穆巴拉克在苏丹政变次日即飞赴利比亚与卡扎菲协调立场,并在阿拉伯世界中率先承认巴希尔政权的合法性。随后,穆巴拉克还亲赴苏丹访问,对巴希尔新政权表示支持。虽然随着后来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本质日益暴露,埃苏关系在图拉比时代跌至冰点,但图拉比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且为新政权的巩固赢得了时间。

二、苏丹穆兄会主流派的分歧

虽然图拉比为苏丹穆兄会主流派最终夺权制定了“三步走”方案,但由于该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遇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必须依照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况且,方案并没有规定巴希尔等军人“还政于民”的具体时间,这为图拉比与巴希尔之间日后爆发权力争斗埋下了隐患。此外,图拉比在政变成功后主张取缔伊阵,事后证明这一决定也是他自断后路的一大“损招”。本来,图拉比认为,解散伊阵不仅可以起到迷惑国际和国内社会的作用,并且也可以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受组织的约束,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建立一个苏丹伊斯兰理想社会。因此,有人把伊阵比喻为一部通向权力和利益的“直梯”,在政变成功后,搭上这部“直梯”的有功之臣被邀出席瓜分利益与职务的“盛宴”,随后,它的功能即被废止了。^{[3] 131}但事实上,在失去了组织作为自己的后盾后,图拉比在与巴希尔的较量中,已经处于下风,并注定了他日后败北的命运。

一般认为,在1993年以前,苏丹政局一直是沿着图拉比设计的轨迹运作的。例如,解散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以及安排一部分伊阵领导人在政府机构里出任要职等,这都符合图拉比当初“三步走”的设想。虽然图拉比本人一直没有在新政权中出任任何正式职务,但他一直掌握着“垂帘听政”的主动权。同时,为了方便接见世界各地慕名前来拜访的政要,图拉比当时出任“非官方”

色彩的伊斯兰和阿拉伯人民会议组织秘书长一职。但随着新政权渡过了前三年的“危险期”，巴希尔与图拉比之间便开始产生不和谐的声音，图拉比派指责巴希尔派迟迟不肯交权，而巴希尔派则抱怨图拉比派权倾朝野，致使巴希尔这个总统形同虚设。^[4]根据图拉比最初的设想，在三年过渡期结束后，军人应该全部退出政权，由伊阵领导的原班人马全面接手，总统一职应由图拉比亲任。但是，由于苏丹在海湾危机中“站错了队”，采取了同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立场，因此，海湾战争后，苏丹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中陷入了孤立。这使得新生的伊斯兰政权再次面临危机，此时如果图拉比出任总统，那对新政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图拉比在权衡利弊后，在下令解散革命救国指挥委员会的同时，不再坚持由他本人来亲自执政，但他要求巴希尔脱去军装，不再兼任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巴希尔是否应该退役的问题，在苏丹政权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分歧。这一动议遭到了巴希尔派的强烈反对。在苏丹的现实环境中，巴希尔深知军权对于政权的重要性，因此，他一再强调留任军队最高统帅一职，以有利于伊斯兰政权的稳定。这一立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更为他在与图拉比的权力争夺中赢得了宝贵的先机。^{[3] 194}

其实，在图拉比与巴希尔的较量中，对最终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另有其人，这就是图拉比的“学生”，原伊阵副书记、现任苏丹第一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塔哈被苏丹各界公认为1989年军事政变的幕后总协调人，几乎所有有关政变的声明都出自塔哈之手。政变后，塔哈出任苏丹社会策划部部长，而社会策划部当时的重要性居各部之首。由于巴希尔政权在政变成功后一直没有设总理一职，社会策划部当时的作用实际上就形同苏丹总理府。塔哈言语谦恭，洁身自好，而且十分有能力，有头脑，有敏锐的洞察力，又有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积累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图拉比曾经对他的这位“学生”十分信赖。但是，令图拉比始料未及的是，塔哈有朝一日会与巴希尔结盟，转头对付他这个“老师”。1993年10月，苏丹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解散后，塔哈与政权中的军方势力结盟，力保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巴希尔担任总统，这让图拉比大失所望。^[5]于是，图拉比开始实施报复行动计划，割断了与塔哈数十年的交情，并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人民会议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改组，解除了塔哈的副秘书长一职。与此同时，图拉比把一部分伊阵的“元老”重新请回组织理事，并提拔任命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图拉比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在组织内部大势培植亲信，以设法阻止巴希尔和塔哈插手组织事务。^[6]

对于图拉比的这些“小动作”，巴希尔和塔哈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由于当时图拉比派的力量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巴希尔派只能继续实施他们的“韬光养晦”策略，等待时机成熟，再与图拉比派决一雌雄。1996年3月，苏丹举行自1989年政变以来的首次总统和议会选举，巴希尔在塔哈等人的鼎力相助下，成功当选总统，而图拉比则被“安排”出任第一届苏丹全国议会议长。从此，图拉比正式从苏丹政坛的幕后走向了前台。此后，在巴希尔与图拉比的权力争斗中，胜利的天平悄然倾向了巴希尔。据分析，巴希尔等人当初之所以赞同图拉比出任立法机构的首脑，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第一，图拉比此前名义上没有正式职务，但实际上在幕后操控着苏丹政局，经常接见外宾和各国驻苏丹大使，并就时局以及苏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一些所谓的“个人意见”。在那个阶段，由于图拉比是以伊斯兰和阿拉伯人民会议秘书长的“民间”身份从事这些活动，因此不受苏丹“官方”的限制，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承担任何官方责任和后果。作为实权派人物图拉比的“个人意见”难免会给巴希尔政权制造难堪和被动。因此，巴希尔派当时以为，把图拉比推上立法机构首脑的位置以后，他的言行举止势必不

会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而不受清算；第二，推举图拉比任议长，有助于他走出“象牙塔”，更直接接触社会各界，既可充分了解苏丹社会的复杂性，又可使他“收心”，不再组织那些令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头痛的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活动；第三，图拉比担任议长以后，就难免与日常的官样文件和繁文缛节打交道，这可分散图拉比对组织建设的关注程度，有助于巴希尔和塔哈在组织内部培植亲信势力。^[5]

但令巴希尔派始料未及的是，图拉比在议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他们感到不安。图拉比利用议会这一舞台，强化了他与苏丹各地方议会领导人的关系，特别是与达尔富尔地区地方议会的关系。因此，日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危机的爆发，也与图拉比和巴希尔最终走向决裂有着密切关系。^[6] 1998年6月，苏丹议会颁布了苏丹永久宪法，规定苏丹是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国家，国家实行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非中央集权制，并明确规定言论、结社自由和政治协商等原则，承认宗教平等、信仰自由，规定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在“还政于民”的问题上对巴希尔军政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7] 1998年底，苏丹颁布了《政治结社组织法》，约30个政党注册成为合法政党，图拉比出任执政党全国大会党总书记。^[8] 在完成了上述一系列步骤以后，图拉比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他将辞去议长一职。但这并不意味着图拉比有意退出苏丹政坛，相反，这是图拉比把他的关注点转向执政党领导机构的改造问题上，通过修改党章和调整党内领导班子等手段，图拉比试图对巴希尔派来个“釜底抽薪”^[9]。

正在巴希尔派和图拉比派的明争暗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空难，导致苏丹政坛本已十分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两大派别的权力之争提前进入了摊牌阶段。1998年2月12日，苏丹第一副总统祖贝尔·穆罕默德·萨利赫乘坐的飞机在苏丹南部因恶劣天气原因失事坠毁，祖贝尔不幸遇难。1989年政变以后，军人出身的祖贝尔一直是苏丹政坛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曾在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中发挥过核心作用，该委员会解散后，他改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在任5年中，佐贝尔与军方、军政权以及执政党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且与南部苏丹的一些领导人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使他在巴希尔与图拉比的权力争斗中，一直充当着平衡两派的角色，在苏丹社会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祖贝尔的不幸遇难，不仅使整个苏丹限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使处于权力争斗漩涡的苏丹政坛产生了剧烈动荡。两派之间围绕祖贝尔接班人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图拉比派坚持由图拉比本人出任副总统，并公然宣称要待时机成熟后取代巴希尔，出任总统，而巴希尔派则主张由亲军政权的塔哈出任第一副总统。两派较量的结果是图拉比派败北。^[4] 于是，图拉比便切断了军政权与执政党的有效联络，独揽党权，形成了苏丹政坛党政双方尖锐对立的分裂局面。

三、斋月决裂

图拉比和巴希尔之间党政分割的现状，使苏丹政坛和伊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危机之中。1999年9月21日，苏丹执政党全国大会党内部亲巴希尔的元老派和实力派人士联名提交了一份“十点建议”，其核心内容指责图拉比专权，独断专行，要求扩大总统的权限。^[10] 这是自政变以来，执政党内部首次对图拉比派公开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引起了苏丹各界的强烈反响。这份建议

后来成为巴希尔剪除图拉比派最有力的托辞。同年12月10日，图拉比操纵苏丹议会就一项旨在削弱总统权限的宪法修正案进行了表决，该法案的核心内容规定了苏丹地方政权新的产生办法。法案规定：苏丹全境划分为26个州，各州享有高度自治权，设有自治政府和州议会，行使地方立法和行政权，州议会议员和州长都由民选直接产生。关于州长的产生办法，还有如下特别规定：由州议会和州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共同组成的一个推选委员会，事先向总统推荐6名州长候选人，由总统选择其中3人参加州长竞选，得票超过50%的候选人当选。^[9]因此，很明显，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总统任命州长的权限将被废止，这无异于图拉比派向巴希尔派发出的“最后通牒”，直接引发了两派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

在议会对上述法案进行表决仅48小时后，巴希尔便宣告苏丹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并宣布解散议会，冻结有关直选州长的宪法条款。巴希尔在通过苏丹电视台宣布上述决定时说：“这些措施旨在重树政权权威和统一责权”，他把苏丹比作一条行进在“狂风大浪中的船只”，“需要一名舵手，而不是两名舵手，否则，船只就会沉没”^[10]。巴希尔还公开表示，执政党全国大会党已经分裂成为互相争斗的“两大派别”。对此，图拉比称之为“军事政变”，认为巴希尔“已经叛变了曾经给予他信任的政治组织，严重违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11]。由于12月12日正值伊斯兰历法斋月4日，媒体后来称这次苏丹伊斯兰阵营的大分裂为“斋月四日决裂”。^[12]

在巴希尔与图拉比的最后较量中，一直掌握兵权的巴希尔显然占据主动，加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不佳，作为苏丹宗教界领袖人物的图拉比本人也难逃其咎，在苏丹国内的声誉也遭到重挫。因此，2000年1月23日，大势已去的图拉比不得不接受来自国内和国际伊斯兰阵营内部提出的和解协议，同意辞去议长一职，只保留执政党内职务。与此同时，巴希尔在次日重新任命了各州州长，并开始对图拉比派进行全面清算，重组政权，将图拉比派一一逐出权力中心。^[5]同年6月，执政党全国大会党召开协商委员会会议，在291名亲图拉比的委员抵制本次会议的情形下，到会的338名委员决定罢免图拉比的总书记职务，并选举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奥马尔为新总书记。至此，斋月决裂以巴希尔派的获胜而告终。

此后，不甘寂寞的图拉比立即宣布退出执政党，另行成立反对党——“人民全国大会党”，自任总书记。该党成立之初，应该说尚具备很强的活动能力。但在巴希尔政权的一再打压下，不少党内元老和重量级人物纷纷离去，该党实力大打折扣，短期内已很难对执政党构成实质性威胁。如2002年2月，人民全国大会党私下与中央政权的死敌、南部加朗反政府武装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巴希尔政权指责图拉比和加朗结成“反对国家的政治联盟”，图拉比等人随后被捕入狱，直到2003年10月才获释出狱。2004年3月31日，巴希尔政权又指责图拉比卷入了一次未遂政变，并指责他领导的反对党勾结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从事颠覆政权的活动，再次将图拉比逮捕。但很快因证据不足而将其释放。

2003年6月，图拉比领导的人民全国大会党又更名为“人民大会党”，抹去早已不切实际的“全国”二字。^[13]值得深思的是，无论是执政的全国大会党还是图拉比的人民大会党，虽然两党都是伊斯兰阵营的党派，但都避免在组织名称上出现“伊斯兰”字样。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斋月决裂已经宣告了自1989年以来执政的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的终结。

四、结语

现阶段，巴希尔政权虽然已经通过斋月决裂完全控制了国内政权，在 1989 年政变之后首次实现了实至名归。但是苏丹伊斯兰阵营的大分裂，已经对巴希尔政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巴希尔政权的执政基础而言，剪除图拉比派无异于迫不得已的“自残”行为，其执政根基已经发生动摇。图拉比作为苏丹伊斯兰界的领袖人物，在巴希尔政权 10 多年的执政过程中，曾发挥过关键作用。随着图拉比的退出，巴希尔政权的意识形态趋向模糊，不少反对派指责巴希尔政权已经沦为“权力、金钱和部族利益”三者的结合体，缺乏凝聚力、亲和力和号召力。^[5]近 20 年前，苏丹伊斯兰阵营打着“救国革命”的旗号发动政变，希望将苏丹从南北内战和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中拯救出来。但是，今天苏丹人民发现国家仍处于贫困、战乱之中，难以自拔。不仅南部苏丹仍面临过渡期后的分裂危险，而且爆发了达尔富尔危机，使苏丹的独立、主权和尊严面临严峻考验。因此，对于巴希尔政权来说，如何巩固其统治基础是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不过，从外交方面来说，巴希尔政权通过这次“白色政变”，为自己找到了出路。按照“成王败寇”的古老逻辑，图拉比被逐出政坛后，巴希尔政权不仅可以乘机摆脱原政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包袱，而且可以把一切原政权的过错，都推到图拉比这位失败者的头上。一方面，这有利于巴希尔政权赢得国内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这也为它摆脱长期以来因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创造了条件。过去，苏丹政权由于积极支持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被美国和周边国家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突尼斯于 1992 年指控苏丹支持突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复兴运动”，宣布断绝同苏丹的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也于 1993 年指责苏丹政权干涉其内政，宣布召回了阿驻苏丹大使；1993 年 8 月，美国把苏丹列入了“支持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组织的国家”黑名单；1995 年 6 月 26 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亚的斯亚贝巴遭遇暗杀阴谋，埃及方面一直指责苏丹政权幕后策划了这一暗杀行动。另外，苏丹政权曾经为绰号“胡狼”的国际恐怖分子卡洛斯以及“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提供过庇护，这更使苏丹政权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因此，图拉比退出苏丹政权，也为巴希尔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划清界线、打开苏丹外交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在斋月决裂之后，巴希尔政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迅速得到了改善。从这一点看，苏丹伊斯兰阵营内部的这次分裂，也为巴希尔政权重塑苏丹国际形象提供了保障。

[参考文献]

- [1]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 2001/2002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2] 提加尼·阿卜杜勒·卡迪尔.伊斯兰军人——是政权代理还是合伙人[N].人民舆论报(苏丹),2006-11-20.
- [3] 阿卜杜勒·拉希姆·奥马尔·穆希丁.图拉比与伊阵[M].大马士革:马克拉马出版社,2005.
- [4] 提加尼·阿卜杜勒·卡迪尔.我们的大穆兄会,我们的小分歧[N].新闻报(苏丹),2006-09-24.

- [5] 提加尼·阿卜杜勒·卡迪尔. 我们的小兄弟和他们的扩张大工程[N].新闻报(苏丹), 2007-03-25.
- [6] 穆罕默德·哈桑·艾哈迈德. 从独裁走向另一独裁[N].中东报(伦敦), 2006-10-11.
- [7] 谢赫·赛努西. 历史与真相[N].新闻报(苏丹), 2006-10-09.
- [8] 提加尼·阿卜杜勒·卡迪尔. 谢赫赛努西责问我[N].新闻报(苏丹), 2006-10-30.
- [9] 阿卜杜勒·瓦哈卜·阿凡提. 苏丹政权之争非军人与世俗政党之争[N].新闻报(苏丹), 2006-11-14.
- [10] 阿卜杜勒·瓦哈卜·阿凡提. 苏丹伊斯兰阵营之争[N].阿拉伯耶路撒冷报(以色列), 2006-11-28.
- [11] 提加尼·阿卜杜勒·卡迪尔. 伊斯兰资本家在伊斯兰运动中意欲何为[N].新闻报(苏丹), 2006-12-10.
- [12] 谢赫·赛努西. 苏丹社会危机[N].新闻报(苏丹), 1999-12-13.
- [13] 伊玛目·穆罕默德·伊玛. 图拉比党取消“全国”只留“人民”[N].中东报(伦敦),2003-06-26.

The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Its Impact on Sudan's Domestic Politics

ZHOU Hua

Abstract In 1989, as the mainstream of Sudan's Muslim Brotherhood, the National Islamic Front of Sudan led by Hassan Al-Turabi, came to power through a coup. The Turabi Mode that overturns a secular government through coups was adopted by Islamic groups in other countries, greatly boosted the growth of the Islamic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that period. However, now nearly two decades later, the Turabi Mode has become a negative model for Islamic fundamentalist groups that wish to control the government. Sudan's Islamic fundamentalist camp has since then witnessed its largest breakup.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out what lies behind the breakup of the National Islamic Front of Suda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udan and the Front as well as the discord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KeyWords Al-Turabi; Al-Bashir; Sudan; Darfur

(责任编辑: 李 意)